

他们当然大量阅读了日本的文学书籍、世界文化书籍、哲学书籍、历史书籍。因此，大量阅读古典著作的有教养的人，一度成为吸引异性关注的品质。所以，在日本军国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，几乎没有日本青年人盲从军国主义思想，因为他们自己具备了深厚的教养。这种教养主义，即使是在战争期间，也通过那些用教养主义武装起来的精英学生发挥了作用。1930年代，日本的军国主义盛极一时，反而是在这一时期，教养主义作为一种旧制高中生的文化完全形成。

看不见摸不着的教养，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。日本学生把教养主义视为一种抵抗军国主义的武器和防波堤。在战争时期，教养主义文化完全成熟。在战争结束以后，每所大学都成立了教养学系，并得到长足的发展。

中国近代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精英，也都通过日本（留学）吸纳了教养主义，但更多地倾向于将教养主义视为“立身扬名”、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。中国的文化精英总是与官场和政治联系在一起，其原因也正在于此。

日本的教养主义贯穿于人格完成的理念，几乎看不到它与政治和社会地位产生过联系的现象。现在，包含在教养主义的“教养”包括如下内容：①作为专业基础的教养——语言学能力；②作为渊博知识的教养——无论人文社会学专业人士，还是自然科学界专业人士，都应掌握的渊博的知识；③作为通过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形成高层次人格意义上的教养。具有教养的人格的形成，不是一种可以克服现在盛行的物质主义或拜金主义的宗教，但却起到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。笔者在这里，希望东亚社会能够大力提倡、复兴教养主义。

“中国近代留学之父”容闳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容闳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，兴奋异常。12月，容闳给自己的朋友谢纘泰连写了3封信，提醒他革命党应该警惕袁世凯，团结一致，防止引发内讧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容闳具有卓越的预见能力。

容闳（1828—1912）目前还不大为人们所熟知，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

第一位留学生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近代留学之父”。同时，容闳也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“接生婆”。不仅如此，容闳也是一位政治改革家、实业家，他通过出境留学，在东西方文明遭遇过程中，率先意识到了近代的意义。

1828年11月17日，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。7岁时，容闳在澳门的一所华侨学校学习英语、自然科学，以及中国古典四书五经等。此后，容闳逐渐成长为和魏源、林则徐一样放眼世界的社会精英。

1847年，容闳跟随美国教育家勃朗（Rev. Samuel Robbins Brown）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。在繁华的近代大都市纽约，容闳深深陶醉于近代文化与文学中。他通读了狄更斯、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，也接触了大量西方哲学家、思想家、社会学家的著作，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吸纳西方近代文明。

容闳是中国第一个体验并领悟到西方近代启蒙思想、近代文明的人。1848年，容闳进入耶鲁大学，并以他脑后的那根长辫和获得的优异成绩引起众人关注。

在耶鲁大学留学期间，容闳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处于至今还不了解西方近代文明的封闭状态。在他看来，中国还在一味地陶醉在“世界中心”的妄念之中，他也因此而认识到留学海外的重要性。

1854年，容闳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，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。当年，容闳启程回国。但是，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的清政府，不可能认识到这中国第一个“海归”的价值，当然也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。于是，容闳辗转于广东、香港等地，从事各种职业，最后来到了上海。在上海，容闳结识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社会名士，而这些人当时仅有的少数了解西方文明的人。

李善兰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，与此相反，容闳则希望借助太平天国之力改造中国。1860年，容闳结识洪仁玕，并向其提出改革建国的策略。具体内容为：①创建近代军队；②创建陆军士官学校；③创建海军学校并组建中国海军；④采用优秀文人组成有效的政府；⑤设立近代银行、金融机构，并确立度量衡标准；⑥确立近代学校教育体系；⑦创建各种实业学校等。

这7项具体方案中，包含了建设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详细内容，因此可以说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方案。但是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无法真正理解和接受他的方案，他的设想还为时过早。

容闳逐渐对太平天国失望，并在曾国藩的“三顾茅庐”下，终于在1863年入幕曾国藩，和李善兰、华蘅芳等人一起辅佐曾国藩。与容闳见面以后，曾国藩委任他为兵工厂的负责人。于是，容闳前往美国，购回大量新式武器，并着手创建著名的江南造船厂。当时，容闳已经意识到人的素质比武器更为重要的道理；并认为提升人的素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先进国家留学。

1872年，在容闳的努力下，30名年仅12岁左右的中国留学生离开上海，前往美国留学。中国近代“铁路之父”詹天佑便是这批留学生之一。但是，由于内讧等原因，留学事业遭受挫折。1881年，留学美国的学生分三批回国。而在同一时期，日本却派出了数千名留学生到美国学习；学成回国的学生，也被分配在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上。留学生政策的成败，似乎也象征着近代中日两国的命运。

1890年，容闳建议清政府建立国立银行，并将其付诸实施。就在这时，容闳再次遭到了来自周围的阻挠，于是他的金融事业计划也宣告破产。后来，在戊戌变法期间，容闳转而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变法派。此后容闳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，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。1909年年初，容闳提出了“红蜻蜓计划”，即为了武装斗争的顺利展开，用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、1亿发子弹。1910年2月，他给孙中山写信，详细介绍了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法。

他的“红蜻蜓计划”当然未能实现。但是，他提出的集中人力和财力，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，却被黄兴等人所接受。

容闳是至今还被中国所忽视的近代第一位知识分子，他是一个具备了国际眼光的觉悟了的智者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教授雷颐先生曾这样指出：“（在近代史上）有很多人由于思想及自身利益等原因，未能超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。但容闳超越了自己曾经参与的或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阶段，毅然投身于新的历史阶段。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，从维新运动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，容闳都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潮流，与时代同步向前。容闳这种思想、实践特点，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是非常稀有的。”

雷颐先生这样高度赞赏容闳：“他象征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。”